

# 二十一世紀評論

## 中國的大學改革

### 廿年中國大學之殤

張鳴

當今中國大陸大學種種質量下滑、學術潰爛等慘不忍睹的怪現狀，其源頭始於二十年前。弔詭的是，二十年前那場政治風波之後，作為學界中堅的大學中人，恰恰開始了走入專業、走進學術的歷程。而這個歷程走到今天，人們看到的居然是學風的浮躁、學術規範的崩解和學術的大面積失範和腐敗。

當然，導致今天這一切的罪魁禍首，並非大學教師，而是政府管理者，但大學教師也是當之無愧的幫兇。

眾所周知，三十一年前中國的改革，是從恢復文革前十七年的舊觀開始的，而教育領域則最先開始了這種恢復。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之前，高考就開始恢復。不言而喻，文革十年，正如當時流行的說法，教育是重災區，而大學則是重災區中的重災區。由於出身的緣故，毛澤東對於教育有着特別的偏好，同時由於他和他的同志多半是五四青年，有思想文化決定論的積習；這種偏好和積習，使得教育，尤其是大學教育，遭致了當局的特別關照，也招致了革命的特別關照。教育跟國家意識形態體系，發生了最密切的關聯；其關聯密切程度，超過了前蘇聯。大學實行黨委制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，都是重點開展區域。文革，只是其中一個走到極致的運動。當然，這種極致的政治運動對於整個國家而言，最大的困惑是維持的危機——如此革命下去，國家的基本運作無法維持。這種維持危機，在高等教育中表現得特別明顯，大學不僅難以向國家輸送維持生存的人才，連自身的存在也成了問題。大學的率先恢復，在當時而言，有着存亡續絕的功用。

從鎖國走向開放的中國，此番的開放，首先是對着西方世界的。因此，在經歷了一個短暫的恢復之後，中國的大學教育，面臨着一個嚴峻的問題是，如何與世界接軌。也就是說，文革前十七年的蘇式大學模式，在開放的壓力下，需要改變。所以，大學的改革，至少在部分的環節，體現在由蘇式專才模式向美式通才模式的轉變。儘管這種轉變，在當時由於意識形態的緣故，被遮蔽在

由於出身的緣故，毛澤東對於教育有着特別的偏好，同時由於他和他的同志多半是五四青年，有思想文化決定論的積習；這種偏好和積習，使得教育，尤其是大學教育，遭致了當局的特別關照，也招致了革命的特別關照。

通才或者素質教育的名義下，但其中向美國學習的跡象，回想起來，還是相當清晰的。

然而，正如統治集團部分人所擔憂的那樣，大學改革不可能不跟「精神污染」和「自由化」有所關聯。他們擔心改革會摧毀教育作為意識形態陣地的特質，而事實上，這個陣地的確在動搖。鑒於「八九事件」中大學成為學生民主運動的中心，即使1992年國家改革再度啟動，大學的改革卻停了下來。隨着1990年代後期中國經濟起飛，當局自以為找到了一條大學改革的新路，這就是所謂的「211工程」和「985工程」。一是投錢，集中財力投向少數尖子大學，同照搬企業中的「計件工資制」，對大學的產出進行量化管理，並將產量數字與大學教師們的待遇掛鉤。二是強化大學的行政控制，所投的錢，由行政系統控制分發。三是實行產業化，大幅度增加學生收費，實行大學畢業生雙向選擇，不再包分配。

這三方面的改革，最顯著的特徵，就是黨和行政的強化。伴隨着這三方面的改革，特別是大學翻了十倍的收費，國家開始把大學招生視為拉動內需的一個手段。於是全中國的大學開始了瘋狂的擴招，在短短九年之內，大學年度招生數就由1999年的93萬，膨脹到2008年的599萬。教育行政當局的目標，說是要把中國的大學教育，從精英教育變成大眾教育。高等教育的確大眾化了，2008年中國大學的毛入學率，達到了23%。研究生的擴招幅度，也在大幅度增加；由1998年的招生數僅僅是7.3萬，至2008年劇增到44.6萬<sup>①</sup>。在大幅度擴招的同時，各個大學大幅度貸款，大興土木，校園和學校建設有很大的改觀。很多城市都在大建大學城，大學的產業化跟瘋狂的房地產開放，實現了奇妙的聯接。

這樣的「大躍進」，結果是形成了行政主導的大學壟斷公司。大學成了產業本身並不是甚麼問題，問題是形成了最糟糕的那種產業——行政壟斷的產業。這樣的產業，兼有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之弊而無其利。一方面，這種大學的確有產業化的特徵，高收費而且唯利是從，各校都在大辦跟市場有關的專業，基礎學科極度萎縮；另一方面，這種產業又是官辦的壟斷事業，由於基本不存在競爭，因此學校的行政機關，衙門氣、官僚氣十足。整個系統，跟行政體系一樣，都在追求數字——課題數、發表量、招生數、大樓數等。學校和教師，也就通過造假、鑽空子，以及制度性規定強迫學生發表論文來完成數字。

客觀地說，現在中國的大學教育依然在學美國，不僅大力引進「海歸」（主要是美國回來的「海歸」），某些學科，甚至直接用美國教材，採用雙語授課。研究生教育，也跟美國一樣，分成研究型碩士和專業型碩士。甚至連美國的常青藤聯盟 (Ivy League) 也要學，若干重點大學公開組織中國的「常青藤大學聯盟」。這樣學的結果，唯一的好處是使得學生的外語水平有所提高。嚴格地說，只能說這種「唯美」是從的學習傾向，促進了學生的外語學習。但真正讓學生外語水平提高起來的，第一位的功臣，還不是大學，而是辦外語培訓的新東方學校。學美國，只學了皮毛，足以增加大學時髦好看外觀的皮毛。

由於基本不存在競爭，因此學校的行政機關，衙門氣、官僚氣十足。整個系統，跟行政體系一樣，都在追求數字——課題數、發表量、招生數、大樓數等。學校和教師，也就通過造假、鑽空子，以及制度性規定強迫學生發表論文來完成數字。

在「八九事件」之後，主動走向學術，走向專業的大學學者們，在高校「大躍進」之前的幾年之內，的確使專業和學術水平有所提高。當時大學中還存在着一定意義的學術共同體。至少在筆者有所了解的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，有所斬獲，湧現了一些有質量的成果。但是，一旦「大躍進」發動，在量化管理和待遇提高強化管理面前，在幾十萬甚至上千萬不等的課題經費投入的誘惑下，著名教授不僅有經費和待遇的好處，而且還有官職的賞賜和各種「江」學者稱呼的授予。每個賞賜和稱號的背後，都有大筆額外的好處費和課題費。大學教授很快繳械投降，拋棄學術共同體，主動或者猶抱琵琶半遮面地投身到「大躍進」的官方洪流之中，迅速成名成家。結果是研究成果質量大幅度下滑，如今在學術期刊和各類出版物中，已經垃圾成堆了。

在成億的資金砸下去之後，大學科研成果的數量的確有突飛猛進的飛躍。所謂「科學引文索引」(SCI)論文和「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」(CSSCI)論文發表量，的確有了大幅度的提高。如果單論發表量，國內國外加在一起，就像中國的大學生數量和博士生數量一樣，均可以在世界排在首位。但是，此階段中國科研的原創性卻並不見好。不僅國內所謂的核心學術期刊愈來愈不學術，被高校「大躍進」中的論文狂飆刺激得大收版面費，變成「要錢」期刊，就是所謂國際上的SCI論文，也不斷被曝出論文造假，以及大量投機低門檻的數據庫、賺取發表量的醜聞。就目前而言，學界「官大學問大」已經成為一種趨勢，不止人文社會科學界，連自然科學界也開始唯官是從。院士的評選，如果沒有官銜，當選的可能性就會很小。

此時的大學教育，不僅沒有實行美式的通才模式，也喪失了蘇式專才模式的優點，屬於典型的邯鄲學步。蘇式教育雖然目的不是培養人才，而是造就工具，因此知識面比較窄，適應性也小，但至少在應用學科方面，技術性好，動手能力強，學成之後，放到工廠後立馬就可以用。但是，現在中國的工科教育，不僅教學和試驗環節馬虎，即使在重點大學，也出現了「非工程化傾向」，少安排甚至不安排實習。到了實習環節就讓學生自己去找地方，結果只能放羊。學生既沒有理論素質，也沒有動手能力。

最糟的是，當下大學學風之壞，已經達到令人瞠目的地步。導師和研究生的關係，基本上是老闆和員工的關係。而本科生教育，則遭受嚴重的忽視，所謂「大牌」教授，讓自己的研究生代課者比比皆是。雖然教育行政部門規定教授必須給本科生上課，但執行起來並不嚴格，形同具文。培養出來的學生，既沒有素質，也沒有技能，更沒有責任心。社會上對近些年畢業的大學生和研究生，已經產生了強烈的反感。一些私企的老闆甚至宣稱，寧可用中學生也不用現在的大學生。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的問題，已經成為當今中國最為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。

不加偏見地說，現在中國的大學，已經墜落到了歷史最低點。除了個別的學院、學系和教研室由於特殊原因還能保持元氣，個別的教授和教師還能保持

不加偏見地說，現在中國的大學，已經墜落到了歷史最低點。除了個別的學院、學系和教研室由於特殊原因還能保持元氣，個別的教授和教師還能保持學術良心之外，大學整體上一直在滑坡，而且下滑速度非常之快。

學術良心之外，大學整體上一直在滑坡，而且下滑速度非常之快，快趕上高空墜物了。現在的大學教育，類似於文革期間的中學教育，擴張迅速但嚴重名不副實。對於相當多地方性院校的學生來說，大學教育僅僅是在他們身上掛了一個大學生的牌子，沒有任何實質意義。不客氣地說，中國的大學，現在已經不能稱其為大學。

必須強調的是，在這個迅速下滑的過程中，學界雖說一直有零星的異議，但作為整體，卻採取了迎合的態度。其中有些人雖然可能是抱着良好的願望，指望在高校數量增長之後，可以換來質量的提高，但畢竟有相當多的人實際很享受「大躍進」帶來的好處——高額的補貼、大筆的課題費和演講費。學界走向學術，最終走到學術的崩解，學界中人其實難辭其咎。本土學者不聲不響，在「官本位」和金錢的誘惑面前，即使是在西方學成歸國的「海歸」，也很難無動於衷。現在的大學，只有衙門氣、銅臭氣，就是沒有學術氣息。大多數教師都因循度日，唯錢是圖。平時聚會，談的不是股票，就是房子，再不就是女人，如果真的談及學術，也是在講怎樣騙到課題費。

在行政強化到如此地步的大學，內中的教師充滿了低俗和因循氣息，功利化瀰漫，甚至溫家寶總理也公開表示對此痛心疾首。即使當局有心要改，也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。更何況，眼下的大學已經變成了壟斷產業。民營的學校，只被限制在職業教育的低層次上。大學教育，國內只此一家，別無分店。學生不接受，就只能出國，而現在能支付得起出國教育成本的家庭，畢竟是少數，所以，只能任由公立大學擺布。壟斷產業，就是利益集團的產業。教育界龐大的利益集團，絕無改革的動力，因為只有這樣的狀況，才最方便獲利。

事實上，在最高當局看來，大學雖然不盡如人意，但作為意識形態陣地，卻保住了。從前思想活躍的校園，現在變得庸俗不堪，從學生到老師，都「低俗化」了，如果再發生甚麼「群體性事件」，大學似乎不再可能成為中心。現在當局的困惑在於，雖然大學安靜了，但卻沒用了。如果不能為國家培養人才，為國家科技發展提供動力，那麼這個政權的維持，最終還是會出現問題。從某種意義上說，現在最高當局對於大學的態度，處於進退維谷之境，不改不行；改，似乎也不行。

如果要改的話，大學的唯一出路，就是另起爐灶。像深圳南方科技大學那樣，由體制內地方力量出面興辦，只要遵循大學的通則——學術自由、大學自治和教授治校，加上充足的資金來源，理應能闖出一條路來。這當然是一種解套的思路，但真的想解決問題，還是得開放，進一步開放。就像中國的改革，沒有開放就沒戲一樣，大學的改革，前提也是開放。民國期間，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，大學的繁榮，事實上是三足鼎立：國立、私立和教會大學並立。

對現在中國而言，大學理論上已經對民營資本開放了。但是，由於辦學的限制較多，而且被嚴格限制在職業教育的低層次上，更由於缺乏外來的刺激和激勵，民營學校還陷在謀利的泥淖裏難以自拔，不僅沒有創出自己的品牌，而

現在當局的困惑在於，雖然大學安靜了，但卻沒用了。如果不能為國家培養人才，為國家科技發展提供動力，政權的維持最終還會出現問題。從某種意義上說，現在最高當局對於大學的態度，處於進退維谷之境，不改不行；改，似乎也不行。



聖約翰大學

大學之殤，不僅導致國家人才缺乏，科技競爭乏力，而且跟住房 and 醫療問題一樣，會逐步成為製造群體性事件的源頭，影響乃至撼動現政權穩定的不安定因素。所以，現政權如果還想維持，勢必要再次啟動大學的改革。

且生源匱乏，名聲不佳，基本上處在高度邊緣化的境地。外資和港資的學校，現在也有了一點，多為中外合辦，控制權基本在中方手裏。比如，中歐商學院、諾丁漢大學寧波分校、李嘉誠投資的汕頭大學等等，至少從目前看，聲譽還不錯。可惜這類學校規模過小，而且專業受限（主要限於商學院），對中國高等教育的大局，還構不成影響。而且據這些學校內部的人講，這類學校也存在逐漸內地化的傾向，教育部評價體系的干預和影響，愈來愈大。

從某種意義上說，中國大學的改革，最佳的途徑是引入教會的因素。熟悉中國教育史的人都知道，中國的現代教育，尤其是大學教育，實際上是教會開的頭。中國最早的大學都是由教會辦的：聖約翰大學，興辦於1879年，1892年開設大學課程；震旦公學，1903年興辦，1917年升格為大學。而國立京師大學堂說是1898年開辦，實際運作則是1903年後的事情了。民國時期教會大學雖然數量不多，學生比例也不高，只佔全部在校大學生的15%左右，但幾乎所有的教會大學都是名校，北方的燕京、輔仁、協和，東部的聖約翰、金陵、東吳，南方的嶺南，中西部的華中和華西以及湘雅，幾乎全部都可以跟國立的清華和北大、私立的南開和廈門大學相媲美。五四運動以後，絕大多數教會大學都變成了世俗學校，既不要求學生入教，教學中也沒有多少神學內容。事實上，民國大學教育的三足鼎立，教會大學舉足輕重。因為，只有教會學校的存在，才可以用其公益特質，有效地抵禦來自資本和官方的謀利趨向。對於教育和醫療這樣的事業，即使全盤市場化，也必須有一定的公益性，否則就難以健康發展<sup>②</sup>。

當然，就目前而言，這種引進教會學校的設想，還只能是一種奢望。對現政權來說，外來宗教一直是一種需要特別警惕的異己力量，開放這種力量進入教育領域，是一種可怕的夢魘。眼下能指望的，似乎只有體制內別種力量的介入，以及民營和外資的投入。如果教育領域全面對這兩股力量開放，造成體制

的鬆動倒是有可能，但能否改善大學的狀況，還很難說。顯然，這些力量的一般興趣都在某些速效而且商業氣息較重的學科上，因為其目的是要掙錢。就業狀況差、難以有眼前經濟效應的基礎學科，不大能引起這些投資者的興致。總之，外資和民辦大學的發展難以改變當前中國大學教育功利化的趨向。這類大學的大量引進，是否會在陡然增加的市場因素中，導致大學教育的另一種形式的傾斜，還未可知。因此，大學教育的整體改觀還難以指望。

總的來說，自文革之後，大學教育的維持危機再一次到來。這種維持危機，跟整個國家政權的維持危機密切相關。大學之殤，不僅導致國家人才缺乏，科技競爭乏力，而且跟住房和醫療問題一樣，會逐步成為製造群體性事件的源頭，影響乃至撼動現政權穩定的不安定因素。所以，現政權如果還想維持，勢必要再次啟動大學的改革。雖說在不觸動現有制度和結構的前提下進行內部完善，是當政者最樂意選擇的改革方式，但這條路肯定走不通。2010年3至4月份關於教育改革綱要的制訂和相關討論，雖然不盡人意，也涉及了當前中國大學的一些根本問題，比如「去行政化」。可是，等到這個綱要最後出台，人們發現，最關鍵的「去行政化」的提法，居然不見了。顯然，在目前利益集團勢力盤根錯節的情況下，期待教育體系內部的自發性改革，是不可能的。這樣一個由教育部領銜的教改，大抵所能做的，也就是在技術上動點小手術。

因此，還是那句話，中國大學的唯一出路，就是開放。從某種意義上講，開放是有可能的，關鍵取決於中央政府跟教育既得利益集團之間的博弈，以及想要進入這個領域的其他勢力的壓力。如果博弈有成果，就可能進一步開放。但是，如果不能開放到教會頭上，問題依然難以解決。當下，中國的教會，正在以非常的速度擴張，有人甚至預計，過不了多久，中國就會變成一個以基督徒為主的國家。這種擴張，其實對於現政權來說，是更不樂見的局面。遍地開花的教會，顯然比教會辦的世俗大學更加讓當局難堪。既然無法遏制教會信徒的增加，眼看着教堂如雨後春筍般林立，開放教會大學，又有甚麼關係呢？只是開這樣的口子，對中國當局來說，還是很難。但是，留給中國當局的時間，不會很多了，大學的問題，很可能在不長的時間內，會引發一連串的社會問題，乃至社會震蕩。

當下，中國的教會，正在以非常的速度擴張，有人甚至預計，過不了多久，中國就會變成一個以基督徒為主的國家。既然無法遏制教會信徒的增加，眼看着教堂如雨後春筍般林立，開放教會大學，又有甚麼關係呢？

### 註釋

- ①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編：《中國統計年鑒》（北京：中國統計出版社，2009），頁796。
- ② 張鳴：〈醫改和教改，應該對教會開門〉，《鳳凰周刊》，2009年6月29日。